

聚焦文学新力量

当代中国青年作家创作实力展(43)

另一种“80后”：清贫、状态、洁净

□王 干

第一次读到的马金莲小说是发在2011年第11期《回族文学》上的《鲜花与蛇》，一下子被吸引了。因为国内的文学刊物很少以白色作为封面的，而《回族文学》可谓别具一格——当然，白色在回族文化中是高尚的色彩。

就在这一期的《回族文学》上，我惊喜地读到了马金莲的《鲜花与蛇》。当时，我还在《中华文学选刊》，嘱咐编辑别遗漏了这篇好小说。从那以后，马金莲这个陌生的名字，开始引起了我的关注。之后我又读到她的《难肠》等小说，而我在写这篇评论的同时，又读到她发表在《民族文学》2013年第9期的中篇小说《长河》，在审稿的过程中，我一反常态，不停地在稿件上圈点，并不时在边上写上“精彩”、“生动”的字样，这是一个老编辑、老评论家难得有情不自禁的喜悦。

马金莲也是“80后”女作家。现在人们一提起“80后”作家往往都与叛逆、时尚、都市联系在一起，似乎“80后”是所罗门瓶子里释放出来的魔鬼，而马金莲的小说为我们展示了“80后”的另一面：冷静、淡定、从容。她有鲜明的女性意识，但她的女性意识被包裹在她人物的生存状态之中；她有鲜明的时代意识，但她的那个时代意识不是在城市上空飞行，而是牢牢扎根在西海固那片荒芜贫瘠的黄土地上。马金莲保持着女性叙事的纤细和柔软，她下笔绵密如针脚，她用笔绣出来一幅幅日常生活的图景。马金莲的小说中，无论情境还是事件的呈现，都极具画面感。流动的画面如摄像机拍摄的一般，冷静客观地记录着西吉贫困地区老人和妇女的生活状态、生老病死，展示着人性的卑微与韧性，给读者带来温情与苍凉的复杂经验。她的笔，很少涉及波澜壮阔的惊人事件，也很少写气壮山河的英雄，她是一个摄取日常生活，在平凡的原生态气息中，沉着地摹写西吉贫困地区底层小人物的人道主义者。她用笔摄制普通人、底层人民的生活记录片，在她的笔下，一幅幅画面构成冷静的生活状态流，她把这最平常的素材剪裁成了起承转合，暗藏生命大况味，追求大味至淡、大道无形的境界。

短篇小说《难肠》中的“她”，是一个连名字都没在小说中出现过的西吉普通农村妇女。但读者能通过“她”日常劳作、奔波、居家及回忆的一帧帧流动画面，看见西吉人的生存本相，甚至能通过“她”了解中国农村贫困地区底层妇女所处的困境。“她”作为一个好媳妇，要照料好婆婆、丈夫和孩子；作为女儿，因无子的亲生父母老无所依，“她”怎么忍心不去照顾，但丈夫却冷眼漠视。“她”爹娘也曾对她说过：“留恋娘家的女人不是好女子。”传统中国有“养儿防老”之说，而当地老辈人传下来的却是“灰土打不了墙，女儿养不了娘”。妇女在娘家与婆家之间纠结，尤其遇见“她”家这情形，“她”最幸福的光景就只剩下回忆中的童年，如定格的照片：父亲编织竹器，她和姐姐争着给父亲递竹篾。而另一个画面则是：父亲像一个讨饭的人一样，站在“她”家门外等着“她”给饭，他不肯进门，“鼻尖上掉下一滴清水样的鼻涕。他不

知道擦去，那鼻涕越来越大，快要落下来时，才见他伸出袖子揩了。他眯起眼睛迎着残阳打量，看了一会儿，眼角有了水，还是用袖子揩一下，接着看”。作为一个冷静、客观的作家，马金莲没有回避也没有更改现实生活的状态，她截取生活的横截面交给读者，把思考空间留给读者，把观察者女儿“长恨此身非男儿”的内心暗自暗伤，还有一个父亲的惨淡晚景，以及他维护自尊的最后抗拒分毫毕现于特写中。我把2012年发表的《难肠》视为马金莲一篇展示深厚叙事功底的优秀之作。

马金莲并不是突然写出《难肠》的，老人尤其妇女的生存困境，在她的其他作品中早有端倪。《鲜花与蛇》写的是农村妇女阿舍连生两胎女儿后，只剩下政策允许的最后一次生育机会，阿舍心想：“一个人，生不出儿子来，上对不起住老人，下对不起丈夫，在亲门党家甚至整个庄子里，都抬不起头直不起腰，活得不如人。后半辈子，免不了处处受人窝囊气。老了，女儿全嫁走了，剩下老两口，眼前连个烧水做饭的人都没有。”所以，这个农妇阿舍一心想生儿子。按照当地的说法，孕妇梦见鲜花生女儿，梦见蛇生儿子，阿舍常梦见鲜花，这把她吓坏了。女人一生，只有有了儿子，才能像《鲜花与蛇》中公婆自述的：“下了一辈子苦，拉扯了一辈子娃娃，侍候了一辈子人，柴米油盐守着锅台转了一辈子，现在熬成婆婆，娶了儿媳，该是她缓下来的时候了。”现实如此，《难肠》之所以“难肠”，因“她”的父亲没有儿子。

不但写作内容在她的创作中是延续性的、流动性的，而且展示生活状态流的做法，也是马金莲一贯的做法，在反复实践后她用越来越娴熟，在《难肠》中可以说用得得心应手。《鲜花与蛇》也是工笔描绘的一幅幅画面，构成生活状态流。只不过，在《鲜花与蛇》中，故事没那么紧凑，显得有些松散，主要原因是画面起承转合气韵略微滞涩，呼应性不强结构意识不强，于是，小说情节显得骨感不足而肉感过刺。《鲜花与蛇》局部十分生动，但对读者的阅读耐力依旧会是一种考验，好在这是一部短篇小说，如果是中篇问题就会更明显。等马金莲写到《难肠》时，问题得到了有效的解决。一是作品中有若干具有线索性质的画面强化了结构的紧凑性，如静悄悄的院子里关着的房门、父亲编制竹器、吃饭、睡觉；二是作品中的画面具有对比、烘托、对应性，相互之间产生张力，如父母施舍乞丐和与乞丐一起吃吃饭的画面与后来父亲到“她”家等饭的画面；三是人物的精神气韵贯穿在作品中，如小说中的父亲、母亲的卑微和自尊、韧性。

中篇小说《长河》可以说是到目前为止马金莲的代表作，这部小说从春夏秋冬四季写了四个葬礼，男女老少四个人或因为病灾、或因为贫穷、或因为自然老去走完了生命的最后一程。“我的父老乡亲，在泥土里劳作了一辈子然后到泥土下面安睡，睡得沉稳、内敛，静谧，一如他们生前所具有的品行和经历的生活”，在这部小说中，马金莲在保持她冷静、从容叙事的风格的同时，又展现了她超常的艺术才情。在女性叙事层面上，可以

说这是一部当代的《呼兰河传》，马金莲和萧红一样写出了家乡父老乡亲在苦难中的人性美，写出了死亡的洁净和生命的尊严。鲁迅在为《生死场》作序时称赞萧红写出“北方人民对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却往往已经力透纸背”，马金莲写出了西海固人民的生的坚强，同时也写出了他们对死的洁净和崇高，“村庄里的人，以一种宁静大美的姿态迎接死亡”，“死亡是洁净的，崇高的”，尤其写少女素福叶短暂的一生，如若桃花，唯美之至。

马金莲的小说平淡，但在平淡中蕴藏着一股力量，这种力量来自自信，来自内心的强大。张承志迷恋西海固，在那里写出了《心灵史》这样的伟大作品。和张承志的强悍和倔强不一样，马金莲的力量是在表面上看不出来的，甚至是柔弱的，但你能感觉到那种无形的存在。《难肠》中的父亲不识字，但会手捧《古兰经》像识字一样认真地看经书；《孔雀菜》中的李富贵第一愿望是希望儿子好好读经，成为阿訇。马金莲的笔下，常见人们捧着《古兰经》，在苦难中，经让人安泰。捧经的人，安守认定的本分，内心祥和，哪怕是面对无常。《难肠》里“她”的母亲去世，小说有这样一画面：“院子里静悄悄的，窗帘门帘都没有搭起来。等她推门进去，父亲蹲在地上，正在编一个笼子。再看炕上，母亲直挺挺躺着，脸上盖着她用过的一片白头巾。她揭开看，母亲早就没有了，只见她五官齐整，头上的盖头戴着端正正，衣裳鞋袜也都穿戴齐全。”母亲去世了，父亲说给她念过讨白了，不用哭。讨白是穆斯林向安拉悔罪的一种形式。一个和父亲过了一辈子的女人走了，再也不会回来，但在父亲的语句中这显得很平常。马金莲笔下的父亲是有信仰、有精神品格、善良而卑微的小人物，她塑造的类似底层百姓不少。

马金莲作品中冷静的生活状态流，轻戏剧性而注重生活的实感和日常肌理，以人物为根基，用画面组接故事，注重情境再现时表象的细节，内在情绪、意蕴的暗示，她刻意提炼炼象征体，而是展现生活的原生状态，作品自然、真实、质朴。马金莲生活在贫困、干旱的西吉，她怀着爱意守望西海固，对故土投去冷静、苍茫的目光，在冷静的背后，又时时闪现着一种温暖的胸怀，而这温暖来自于悲悯的情怀。

在写本文时，我在网上搜索了一下马金莲的资料，发现这个作者的人生历程也不像那些“80后”那么幸运，她来自于西海固的穷乡僻壤，2003年师范毕业后在家务农，而后结婚，担任小学代课教师，而后经过考试成为正式编制的小学老师。她在自述《这之前的时光》中说到：“2007年，知感恩主，感谢生活，感谢我的良师益友，我看见了命运的笑，感到了生活的温暖。以后的日子，我要好好生活，安安静静地写作，握一支笔，在小说的路上不管能走多远，我想只要坚持走了，便对得起生活，对得起这一生。”与生命相伴，与文学相伴，安安静静地写作，马金莲的路很长，也有更大的发展空间。

■评论

漂移与交流

□王雪瑛

部的赞赏，也收获了上海才女苏月的纯真爱情，这是马克的第三次漂移。之后，马克指使部下用阴阳合约做假账，不仅失去了苏月的爱情，还被总部勒令放弃3年的所有报酬，这是马克的第四次漂移。最后，马克又应聘去浙江一家民营集团，准备洗心革面，再起新的人生之路，这是他的第五次漂移。可以说，小说的情节展开就是马克人生之路上的一次次漂移。他就像一张化学实验中敏感的试纸，检测着、反映着这个时代，显示着东西方文化交流的丰富层面。

马克是地道的美国青年，他来到上海生存发展的经历，展现了国际化背景下新生代冒险家的生活情态，为人

“字思维”与高凯的诗歌

□耿艳艳

的光芒，既可以把外部的世界照亮，又可以把自己的内心照亮。

《高家岭》《高家壕壕》《生我的那个小山村》等是由具体事物的命名展开联想的，既融入了诗人浓浓的乡情、乡愁，又体现了他以一贯之的寻根意识。还有一些诗歌善于通过一个动作来展开诗意，如《信天游》中的“胡唱”、《蜜蜂之歌》中的“飞来飞去”、“看见”、“看见”等。有时他用某人的一句话来进行铺陈，如《你真的坏》中的“你真的坏”、《寡妇》中的“人家的男人不在了”等。有时，他还围绕某个数字荡开思绪，《回家》就是围绕数字“3”展开的：3天后找到家门的猪、丢失了3个月的驴子、3年后才找到家的黑狗。与30年没有回家的自己相比，一种由热爱而生的对家乡、对故土的愧疚乃至忏悔之心油然而生。在他的长诗《先考先妣》中，他用“咳嗽”串连起父亲的形象，用“小脚”来叙写母亲；在《老妻指桑骂槐的母亲》一诗中，当我们全都酣睡时，母亲“指桑骂槐”地说：“吃/吃/光知道吃/光知道睡/吃了/睡了/都是些没出息的东西”，当我们开始忙碌时，母亲则又“指桑骂槐”地说：“乖乖们/好好吃/都给我好好吃”，一个辛劳持家、望子成龙的母亲形象呼之欲出。高凯的许多诗歌，为我们开启

■新作快评 蔡东《无岸》、《民族文学》2013年第3期

难以泅渡的幸福彼岸

□双鱼

“80后”的蔡东笔触老练、直击人心，从《结发》开始，蔡东独特的文字风格正在逐渐形成。她理性而冷静的叙述背后，往往暗藏着看透世事的决绝与彻骨的无奈、悲凉。蔡东用自己年轻的笔，一次次轻易地戳穿了一击即碎的现实与幸福。

小说《无岸》亦是如此。45岁的柳萍生活在“永不匮乏的梦幻之城”，一向自视甚高的她“熟悉各种品牌，追求生活品质，颈上白金链子松松地挂个碧玉坠儿，手挽上一圈绿莹莹的翡翠镯子”，“一副有家底的模样”。然而，就在她的女儿小童接到美国普渡大学录取通知的那一天，这种虚幻的幸福被全然打破了——“通知书带来的幸福很快幻灭，与之为相伴而来的，是五万美元的学费”。柳萍在彻夜清算过自己的家产之后，终于决定向单位后勤办递交周转房申请表，想以此卖掉现在的住宅，筹得女儿大学四年近200万元的巨额学费。谁知，“不卑不亢、坦诚大方”的她却遭到了熟悉官场套路的何主任的直接拒绝，简单粗暴、不留余地。走投无路的柳萍将一腔怨气发泄在日渐衰弱的丈夫董家羽身上，在一个夜晚的争吵、谩骂、痛哭之后，柳萍最终与丈夫摊牌，将自己被羞辱的过程完整地告诉了他。此后，深处处世哲学的董家羽对柳萍展开了秘密的“受辱训练”，教她再次面对何主任时应如何“委婉、平和、女性美、软和话、别敏感、和风拂面，如沐春风、面带微笑、柔化处理，仔细揣摩，小心应对，听之任之，唾面自干……”小说最后，女儿小童带着自己的未来、父母曾经的梦想和无法解决的债务难题离开了。柳萍与董家羽则留在现实生活中，一边为自己年轻、优秀的女儿骄傲，一边继续进行着几乎是永无止境的“受辱训练”。

柳萍的绝望来自难以偿还的巨额学费，来自后勤办何主任的恶毒刁难，更来自自己曾经热爱过的生活给她的一记记猛拳。这个曾经“顽强地爱着生活”的中年女人在坚硬的现实面前终于慢慢低下头来，从一个“进取用世”的中年人逐渐变成一个“懒得操心，懒得折腾”的普通教师。在女儿的学费危机之后，一向颇具自我安慰精神的她终于看清了自己的“徒有其表，不攻自破”。

小说中的每个人物都面对着两个完全相悖的世界：于柳萍，一个世界是自以为是的高清和曾经以为有高枕无忧的中产阶级，另一个世界则是与女儿的巨额学费相伴而来的羞辱和无足措手。于董家羽，多年的瑜伽修行让他生活在一个仙风道骨的内心世界中，然而当他在柳萍的“受辱训练”中扮演起何主任时，那个曾经官场失利的内心世界被彻底毁灭。“周字间的清气消失了。对于年轻的董小童而言，在父母满含愧疚的爱中，她逐渐拥有了城市孩子所独有的自信、骄傲、昂贵，可谁又能料到，这个清新秀气、身段美好的姑娘却有着一头颓败的少白头，“白发之下，年轻的脸上有种说不出的怪诞”。小说中的三个人如此相似地有着波澜不惊的外表，在此之下，却是满怀心事、伤痕累累却不足为外人道的内心，他们无奈而不知情地生活在两个世界的夹缝中——此岸，是虚幻的现实；彼岸，是难以泅渡的幸福。

蔡东一向不喜抒情，也不爱发表议论。《无岸》的故事何其真实，让每个有都市生活经历的人都有戚戚焉。小说不仅写出了都市人的生存重压和幸福幻想的不堪一击，更让我们看到了，在残酷的现实面前，连爱都是这么的孱弱与虚无。

们近距离认识“漂移者”提供了精彩的样本。这是一个崭新的文学形象，凝聚着东西方文化交流、碰撞的多种形态与层次。他进入高档酒吧，与女招待波兰以及酒吧女老板的关系、鲜明地显示了他所代表的西方文化特点。在遭受女老板的羞辱后，马克毅然辞职，开始了他自己的创业生涯。这一过程是孙颢展示的人物个性与文化个性的重点所在。

马克执著爱恋的上海姑娘苏月是小说中第二个重要的人物，苏月的身上有着海派文化的鲜明特征。她既开放现代，又传统典雅；她妩媚温柔，更独立自信；她既有情感的缠绵与困惑，更有自己的理性与从容。如果说她投入与马克的热恋是一种幸福而感性的被动，那么最后她毅然离开则是一种痛苦而理性的主动。苏月的独立和自信充盈着现代精神。在苏月的身上寄予着作家孙颢对现代女性理想的理想，以及对东西方文化平等交流的期待。

小说通过马克与苏月情感关系的诸多细节生动地演绎着东西方文化的差异与碰撞，在民族国家、个人、跨国市场三者的互动关系中塑造了新生代冒险家马克和现代独立的上海女性苏月，表现了作家对现代性问题与城市生活的思考。

生，又有动态的状写，有时又是动静结合、虚实相生的情境。比如《喜鹊》一诗，从站在树梢头的喜鹊到窗花剪纸里的喜鹊，从流动的情景到凝固的图画，一幅吉庆祥和、富有民间趣味的喜鹊图跃然纸上。

“字思维”方式的运用，极大地开拓了高凯诗歌的审美空间，成为他诗歌艺术的形式之一。在诗歌意象的创造上，高凯成功运用了“字思维”的思维方式。比如，在《关于算盘》《野葡萄》等诗歌中，对于善于算计别人的“算盘”，以及眼睛犹如“野葡萄”的姑娘的描写，都能够创造出令人难忘的诗歌意象。再比如，在《陇东民歌》组诗里，他用赞美和悲悯的情怀来叙写旧时代的妇女，并且独具匠心运用“门槛”的意象，使之成为当时妇女命运的一个象征：“一个低低的门槛/挡住了女人的一生”（《屋儿人》）。于是，跨越这道“门槛”，也就成为了妇女解放的一个隐喻：“挡腿的不就是一个/先人的门槛么/再高也要跳过去”（《离婚》），所有这些，都体现出诗人对生活的细致观察和独特思考，熔铸了他的人生智慧和诗学修养。

此外，运用“字思维”的诗意创造方式还可以避免大而空洞抒情，增强诗歌的叙事性。诗人通过字与字、词与词的组合，创造出一个个意义充实丰满而又内部相互关联、彼此呼应和的诗歌意境。高凯的《村小/生字课》《陇上》等诗歌，都因“字思维”的妥切运用，既不流于空泛又意境优美，成为不折不扣的优秀诗篇。

让文字像花朵一样绚烂

□马金莲

从嫁人那天算起，我离开生我养我的那个小山村整整9年了。尽管时不时回去，但是从严格意义上讲我已经不是那个村里的一员了，我只是从这里嫁出去的一个女儿。这些年我在外头奔跑，为了生计，不断地变换生活方式和工作内容。但是内心总是牵挂着一个地方，这就是扇子湾。在外头的时日久了，倦了，累了，只要一走进扇子湾，趴在母亲的热炕上，感觉就像小时候扑进了母亲的怀抱。没有顾忌，没有担忧，可以撒娇，可以撒野。和遇上的每一个人打招呼，知道他们的过去和现在。趴在老杏树最顶端的枝头，摘杏子的同时顺便打量全村子。远远望着老坟院，想象着亡故的亲人们睡眠的姿势。

更喜欢的是站在远处望着老祖母。她像一束被风抽干了水分的荞麦，轻飘飘地在有风的院子里走动，给牛添一背苜蓿草、给狗和半盆子食、给母鸡抓一把圆囤麦子。她劳作了整整80年，现在还不肯歇缓下来。她对生活很满足，从不埋怨什么，倒是常常念叨起过去的艰难，说曾经吃糠咽菜、穿着补丁摞补丁的衣裳，现在的年轻人幸福得很啊，吃的是清油白面，穿的衣裳没一片补丁，出门不用双脚走路，坐小车载摩托。

说着说着就吃吃地咳嗽起来。她一共生养了6个儿女，6个月子里竟然都是喝冷水吃软粮面，没吃过一枚鸡蛋。她把用过的塑料袋叠起来，将得平展展的，放在箱子里，还有些孙子们念过的书，也都整整齐齐保存着。我说留这些有什么用呢，早该扔了。她舍不得扔，宝贝一样留存着。有一张新毛毯，一床新被褥，她照旧舍不得用，炕上铺的褥子已经看不出最初的颜色和花纹了，都被补丁层层淹没了。我歇了半天，依稀发现有一块布是当年的除销布，问她，果然是，当时缝褥子就是用除销布做的面子。这褥子的年岁竟然和我一般大。

儿女拿来的新衣裳，她一件件压在箱子里，日常根本不穿，总是穿得很朴素，甚至有些破旧，为此没少挨几个儿子的骂，记得有一回我父亲干脆生了很大的气，逼着祖母把烂衣裳换下来，他要塞到炕洞里烧了去。祖母磨着一堆补丁衣裳，在炕上说娃娃你来，我给你说说1958年、1960年的饥荒，我们是那个年月熬过来的啊，你叫我咋能把那些苦日子忘掉呢。父亲叹了口气，不再勉强。第二天我祖母还是穿着她那身旧衣裳扫院子背柴火，动作利索，神情安祥。

看着这样的祖母，我常常有一种时空错位的恍惚感，感觉时间还停留在小时候，我还是那个懵懂无知的小女孩，在扇子湾的大地上奔跑，做着人生最初的认识与成长。然而，现实是一切都已时过境迁，时间的河流在扇子湾一刻也没停歇，当年的孩子都长大了，中年人变老了，老年人相继谢世走进黄土里去了。

在现代化的城市生活中，我常常想起扇子湾，想起家一张熟悉的面孔，想起一棵柳树或者杏树，想起沟畔的乌桕鸟，想起天边翘着尾巴饮水的松鼠，想起开紫花花的苜蓿，想起鼓胀着肚皮的甜豆角……时间在向前走，怀念却沿着记忆的道路往回走。就在这怀念中，我重新思索一些人和事。那些留在记忆里的面容和细节，那些善良的心声和笃定的信仰，那些硬朗的身姿和爽朗朴素的笑。

在西海固深山里，默默无声简单朴素地活着的不仅仅是祖母，还有很多人。他们对生活没有过多的奢求，就那么简单朴素地活着。一件农具坏了修修，一件衣裳破了补补，一个瓦罐漏水了箍箍，从不去想外面的世界有多么繁华，从不去想别人在怎样奢侈地活着，不奢求穿上绫罗绸缎，吃上山珍海味。只盼望风顺，农家的日子平平顺顺。我常常想着他们一个个的人生，简单得一眼能看到底，但也有艰难，在清贫中苦苦挣扎的艰难。我一开始就书写他们，现在是，将来也还是。他们平淡普通的生活里蕴含着多少闪光的财富，我只遗憾自己的水平有限，不能更深入地挖掘更好地生活。

也许写作者就是这样，活在无尽的思索与怀念里。

另一方面，我面对着他们的当下。扇子湾年轻一辈的人和事，和所有当下中国的村庄一样，扇子湾的年轻人纷纷外出打工，他们穿梭在陌生城市的大街小巷里，有些挣扎在道路上，有些变成了外地人，有些人像候鸟不定期回到村庄。我试着将笔触延伸到他们，写他们的渴望与追求，欢乐与疼痛，成功与失败，男人与女人，老人与孩子，思念与留守。当然，我只是以一个生活的观察者、记录者，与女施主描写扇子湾的人与事。常常，当我只是扇于湾的某一个某一件某事的时候，我都禁不住遥遥祝福，祝福我的父老乡亲，不管是留在村庄里的还是外出的，是亡故的还是活着的，你们一定要幸福。

我在一边书写一边祝福，我的梦想是笔下的文字能够像山间的花朵一样绚烂，开出一朵又一朵，一片又一片，连成一幅独特的风景。